

从“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

——魏晋之际的“才”、“德”之辨

王明前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曹魏王朝倡导“唯才是举”原则,但是也并非完全放弃对儒家道德价值的追求,不仅有限度地恢复汉代选举制度,而且设置专门机构加以监督。特别是文帝创设九品官人法,通过制度化的中正制度,力求达到“德”与“才”价值取向的平衡。西晋是九品中正制确立的关键时期,但是西晋朝臣有关废九品中正制的灼见,是西晋政治腐败和统治危机的曲折反映。

关键词: 曹魏;西晋;“才”、“德”之辨;“唯才是举”;九品中正制

中图分类号: K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695(2011)02-0071-05

魏晋之际,曹操倡导“唯才是举”;其继任者曹丕创制九品官人法,后逐渐演变为九品中正制。这两种选拔与评价人才的方法不仅为魏晋政治的时代特色,而且影响后世深远。史学界对“唯才是举”和九品中正制均有较深入探讨,特别是对九品中正制研究已经进入微观和量化的阶段,成果丰硕。^① 笔者注意到,“唯才是举”强调选才的实际才能,而九品中正制则以道德评价为优先取向。在魏晋之际,关于“才”与“德”这两种评价标准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成为魏晋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笔者不揣浅陋,以才、德价值取向为线索,对这一政治现象做一简单梳理,以期增加学术界对魏晋之际政治变迁的认知。

一、曹魏时代的才、德之辨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下达求才令,言词恳切:“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1]32}

这一年为赤壁之战后二年,曹操已基本扫荡北方群雄,特别是战胜不仅实力雄厚且世代公卿的袁绍,却又被大江阻隔而无法一统华夏,其政治势力的扩张几于饱和。因此这道求才令尽管言辞恳切,但是仍然属于理性思考后的政治经验总结。该令确立了“唯才是举”的选才原则,同时由于以轻视道德的论证如“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而成为历史上以实际才能选拔人才的范本。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再次下令重申这一标准,特别是对道德条件的降低做出进一步解释:“昔伊挚传说处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1]49} 曹操强调“不仁不孝”的吴起等人道德水准的不高尚并不妨碍其凭借“治国用兵之术”而成就事业,进一步重申了“唯才是举”

* 收稿日期:2011-01-10

作者简介:王明前,男,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

① 参见: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等。学术界对魏晋“才性论”有过一定探讨,如唐长孺《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载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1-292页。但是才性论基本属于哲学范畴,难以涵盖魏晋之际人才选拔及其相关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故笔者提炼才德之辨作为论述线索。

的选才原则。曹操尤其欣赏春秋管仲的德才观。他早在建安八年(203年)就表示:“议者以军吏虽有功能得才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于权’。管仲曰:‘使贤良者食于能则上尊,辟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无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辟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欤!”。^{[1]24}

曹操斯时已建立魏国,代汉立新朝已无实质障碍。因此这次求才令对道德条件的进一步解释充分证明,“唯才是举”是曹魏政权成熟的施政倾向。因为在这之前并非无人劝谏曹操反其道而行。如荀悦早在建安十年(205年)就谏言:“典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这之中他尤其强调教化,认为“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起形也。若教化之废,难中人而随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途,是谓章化”。^{[2]206}显然这些建议并未被曹操重视。学术界对曹操倡导“唯才是举”议论颇多,或归之于其宦竖出身,或归之于其扫荡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势力而有意改弦更张的变革意识。^①上述分析言之成理,然而笔者认为“唯才是举”的选才标准更应被视作是对以汉末清议为特征的选才模式的反动。曹操尽管在起家过程中得到颍川士人集团的支持,并有意笼络之,但是他对荀彧等不过是实用主义的利用,其实质与依靠谯郡曹氏夏侯氏武装集团争战和枣祗等兖州吏员管理地方行政并无二致。因此曹操的见识并非依靠学术滋养和文化积淀,而纯粹来自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曹操在其政治暮年仍然不放弃这一明显背离儒家伦理传统的政治创见,也不无为未来曹魏新朝奠定迥于前代的政治风气的考虑。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草莽英雄,他早年即因操守修行卓越和具有一定儒学背景而被举孝廉,最大程度地扭转了其宦竖出身带来的恶劣影响。因此他不可能孑然放弃儒学教育建设,因而客观上也就从未放弃对道德标准的追求。建安八年(203年)“秋七月,令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万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1]24}曹操

有感于战乱造成的教育体系瓦解,有意重新恢复旨在弘扬“礼让之风”的“先生之道”。因此,曹操虽然倡导“唯才是举”,但是仍然不放弃汉代的选举制度。只是既然要对前代弊政有所反动,因此有意加强对选举的监督。曹操在自己的霸府中派专员专司其职,实现这一监督目的。“太祖为司空、丞相,(毛)介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1]375}另一位丞相府东曹掾何夔则劝谏曹操尽快恢复汉代乡评制度:“夔言于太祖曰: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使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负。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争竞之源,以督群下,以率万民,如是则天下幸甚”。^{[1]381}在何夔看来,道德评价应该在人才选拔中处于优先地位。他所列举的“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使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的理由,也确实切中时弊。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这说明曹操倡导“唯才是举”的同时,并不根本放弃对旧选举制度的改造。所谓“制度草创”的局面,也确实需要曹操政权权衡利弊,在选才问题上做出协调。

魏文帝的施政倾向大体遵循曹操制订的选才标准,强调才的优先地位。黄初元年(220年)“秋七月庚辰,令曰:轩辕有明治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1]60}要求朝野上下各守本分,做出一副勤政姿态。“黄初二年(221年)春正月,初令郡国口满十王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1]77}在恢复前代选举制度的同时,魏文帝进一步以“有秀异,无拘户口”的形式鼓励突破汉代选举体制框架束缚。所谓“秀异”,与“唯才是举”的“才”涵义接近,都有不拘一格的意义。这一精神很快在次年得到重申:(黄初三年,222

① 参见唐长孺:《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载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1-292页;陈家鼎:《论曹魏的选举制度和世族化过程》,《益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等。

年)“诏曰: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1]79}其后,又鉴于“初平以来,学道废堕,(黄初四年)夏四月初立太学,置博士,依汉制设五经课试之法”,^{[2]2218}加强国家对儒学教育建设的指导。

尽管如此,魏文帝留给历史最具有个人印记的政治行为,却是他即位后即做出的一项复辟前代选举制度的举措。曹丕任命陈群制定九品官人法。^{[1]635}“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2]2178}其主旨是郡县均设中正,州设州都,专门负责选举事宜。该制度“一方面保留乡间评定的残骸,另一方面又将向来与政府对立的或是代表大族名士势力的选举威权转而与政府合作。中正制度的设立就发挥了这样一个作用”。^{[3]92}日人宫崎市定认为“实行九品官人法的最初意图,是准备在可以预见的魏晋革命时把东汉朝廷崩溃后的官吏吸收进魏朝而拟定的便宜之计”。^{[4]7}其实,曹氏代汉的政权更替早就通过曹操霸府政治,从司徒府到丞相府,再到魏国逐步实现,^[5]大可不必如此煞费苦心另外为实现政权更替的平稳过渡创设新制度。相反,九品官人法可看作汉代选举制度对曹操“唯才是举”原则的复辟。这一制度发展到西晋,在中央由司徒府负责,^{[6]128-132}将乡评与官员考绩相结合。

但乡评与考绩之间因而抵牾顿生。乡评侧重以道德标准品评,而考绩侧重实际行政能力。魏明帝时,社会舆论指责曹操时代偏重“唯才是举”的呼声成为议论主流。董昭批评“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撻,毁坏风俗,侵扰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1]442}间接批评曹操时代对才的片面侧重,导致“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的社会价值观。而卢毓则更明确地要求魏明帝确立选举的道德标准。“(明帝)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1]651-652}在卢毓看来,道德的约束力量要比单纯的实际才干更

重要。杨阜则希望明帝“诏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敦朴之士而选用之,此亦求贤之一端也”。^{[1]706}

还有部分朝臣是借抱怨曹魏政权由于恢复旧制不利而导致制度不完备,来阐述其对“唯才是举”原则的批评。本来明帝令“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论,制下百僚”,以期考绩有章可循,吏治步入正轨,却引来司隶校尉崔林的非议:“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率,备之以科条,中之以内外,增减无常,固难一矣。……太祖随宜设辟,以遣来今,不患不法古也。以为今之制度不为疏阔,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式是百辟,则疏敢不肃?”^{[1]680-681}严明考课,本是整肃吏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行政效率的善举,可崔林反一味指责太祖“随宜设辟”。曹操执政时,以“唯才是举”为原则,对人才选用不拘前代成法和道德窠臼,方能革除汉末弊政,实现行政高效。崔林此议本来是本末倒置,但反映出曹魏士人对汉代选举制度特别是乡评的留恋。即便曹操并未摒弃而只是加强了对选举的监督,仍然难逃指责。崔林所谓“若朝臣能任仲山甫,式是百辟,则疏敢不肃”,才是他议论的关键。崔林因此认为吏治成败与否取决于士人的责任感即道德水准。程昱也鉴于“校事放横”,认为是“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名,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故置校事”,因此是“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所以“纵令校事有益于国,以礼义言之,尚伤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复不罢。是袞阙不补,迷而不返也”,^{[1]480-431}实际上仍然在呼吁道德价值取向的回归。刘靖则直接批评曹魏代汉以来官方统治思想建设中忽视儒家学术精神的疏失。他指摘“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1]464},缺乏倡导儒学教化的社会风气。

但是,夏侯玄对上述论调进行了反驳。他首先对两种品评标准做了对比:“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然后他指摘“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緌緌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他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即干预官府正常考绩功能。为此他建议“岂若使各帅其分,官民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

阁则据其官张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负责自在有司。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负责在外。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疏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1] 295-296}夏侯玄理想的选才模式,仍然强调以实际才能为优先取向,着意指出中正的职责应在“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的范围,其权力应该在“勿使升降”之内,亦即道德评价仅为参考标准。行政部门的考绩即“台阁则据其官张能否之第”,才是主导因素,再“参以乡闾德行之次”,如此才能做到“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达到“静风俗而审官才”的效果。夏侯玄此论实际上开启了西晋时期要求废九品中正制的先声。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集团急于为自己的胜利披上合法性外衣,他们指责失败的曹爽集团浮华奢侈。对曹魏政权贬抑道德标准心怀不满的士人借机放心大胆地表白心迹,抒发愤懑。“(魏齐王)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奏博问大臣得失。(王)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起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求束,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于朴”。^{[1] 749}在此王昶附和司马懿对曹爽一方的指责,借抑止浮华来弘扬道德精神的主导地位,所谓“欲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以及“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表面看是鼓吹儒家伦理教化,实际上是把“浮华”、“侈靡”之类的时弊作为对实用主义“才”能追求的体现而加以抨击。但是曹魏毕竟还未统一华夏,严峻的政治斗争形势也迫使士人对曹氏的实用主义政策持保留态度。于是王昶仍然不得不肯定“考试”、“治绩”之类肯定实际才干的现行标准。

总之,曹魏王朝既然兴起于汉末群雄逐鹿的乱世,其政治对手又占有道德积淀的天然优势,因此其选才标准自然更侧重实际才干,倡导“唯才是举”原则。但是曹魏武帝、文帝和明帝三代也并非完全放弃对儒家道德价值的追求,不仅有限度地恢复汉代选举制度,而且设置专门机构加以

监督。特别是文帝创设九品官人法,通过制度化的中正制度,力求达到“德”与“才”价值取向的平衡。相关研究表明,出自士族的官员由曹操时代的百分之二十九上升到齐王以降的百分之四十二;出身平民官员的比例则由百分之五十六锐减到百分之十五。^{[7] 126}于是,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士人集团,不甘心道德精神亦即该集团社会舆论和天然道德传统积淀优势地位的丧失,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恢复道德标准的优先地位。

二、西晋时期关于废九品中正制的议论

西晋王朝继承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并以司徒府主持典选,使之进一步与中央权力架接,试图实现乡评清议与行政考绩的平衡与合流。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诏曰:郡国守相,三载巡行属县……士庶有好学笃道德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8] 57}从而确立以德为优先标准的选才原则。

但是西晋朝野要求废除九品中正制的呼声不绝。最有名的议论来自尚书左仆射刘毅的“八损说”。他开宗明义指责:“魏立九品,权时之制”,不能算得成熟的善举。之后他提出立政所需的三条标准:“立政者,以官才为本,官才有三难,而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而中正制度无法解决以上矛盾。相反“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结果由于“今之中正,不精于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此论最终落实到对“才”的强调上:“既以在官,职有大小,事有剧易,各有功报,此人才之实效,功分之所由也。今则反之,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重虚名也”,结果必然是“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8] 1273-1276}刘毅此论说明尽管士人希望道德标准的价值回归,但是现实政治运作中官员考核与乡评清议的矛盾严重损害了西晋政权的行政效率,迫使有识之士必须认真权衡九品中正制中才与德的辩证关系问题。杜预建议“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谐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

其六岁处优者超用之,六岁处劣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8/1025-1026]客观上否定九品中正制的重要环节乡评的价值。汝南王司马亮和司空卫灌也上疏表示:“魏氏承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今九域同现,大化方始,臣等以为宜皆荡除末法,咸用土断,自公卿以下,以所居为正,无复具客,远属异土,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则毕竟自息,各求于己矣。”^[2/258]何曾则站在强调实际才干的立场上,批评地方官人浮于事、尸位素餐:“臣闻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体性疏忽,不以政理为意,在官积年,惠泽不加于人,然后考刻之限,罪亦不至绌免。故得经延岁月,而无斥罢之期”,因此他希望加强考绩,“可密诏主旨者,使隐核参访郡守,其有老病不隐于亲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烦扰百姓者,皆可征还,为更迭代。”^[8/994]之所以会出现朝臣集中抨击九品中正制的现象,元人马端临在比较两汉选举后的结论或较中肯:“盖乡举里选者采毁誉于众多之论,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于一人之口。”^[9/267]

但是亦有主张废九品而复辟汉代乡评土断之法者。李重鉴于“承魏氏彤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期,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郡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指责“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试非经图不刊之法也”,建议“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8/1309-1310]此论建议“开移徙,听相并就”,以为由此可以恢复汉代土断乡评传统,实际上亦属本末倒置。因为一旦如此,只能便利于世族豪门兼并国家编户,以荫户方式强化其庄园经济,对中央集权政治实无裨利。但是,此论代表了西晋政治生活中一股强大趋势。因为西晋政权通过占田法,虽然默认了封建地主庄园经济的现状,但占田法也制造出大量私有小农,作为国家编户承担田租户调义务,与封建庄园经济并行。因此李重此议不仅仅以恢复土断为目的,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图谋。

段灼则进一步借批判九品中正制,要求恢复魏初的“唯才是举”原则。他指出“士无立业,行非一概。吴起贪官,母死不归,杀妻求将,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

谋”,几乎是曹操求才令的翻版。他恳请晋武帝“畴咨博学广开贡士之路,荐岩穴,举贤才,征命考试,匪俊莫用”。他批判九品中正制下的选举,“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8/1347]此论在西晋关于才德的议论中,是对“才”肯定最直接而大胆者。通过对曹操求才令精神的重申,对九品中正制做出反动。这说明,“曹魏、西晋时专制官僚政治仍有相当活力;官僚保持了较大的流动性。”^[10/336]

西晋是九品中正制确立的关键时期,但是以上分析表明,朝野上下要求废九品中正制的呼声一直很强。这反映了晋武帝政治风格的二重性。司马氏在尽力维护士族特权的同时,另一方面毕竟已经上升为皇族,必须“扩大统治基础,尽可能地选用贤材,以保证吏员素质和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11/163]

综上所述,曹魏王朝倡导“唯才是举”原则,但是也并非完全放弃对儒家道德价值的追求,不仅有限度地恢复汉代选举制度,而且设置专门机构加以监督。特别是文帝创设九品官人法,通过制度化的中正制度,力求达到“德”与“才”价值取向的平衡。西晋是九品中正制确立的关键时期,但是西晋朝臣有关废九品中正制的灼见,是西晋政治腐败和统治危机的曲折反映。

参考文献:

-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唐长孺.九品中正制试释[M]//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92
- [4]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5]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7
- [6]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 [7]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2002
- [8]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0]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1]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小田)